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西方
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设计 王 俭
美术编辑 傅惟本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5 插页 5 字数 518,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815-X/D·514

定价 36.00 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煮 陈 昕 黄仁伟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失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

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摧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阂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绝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重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

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饕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 5

致 谢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完稿之际，谨向以下单位及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

感谢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FIA)对我的访问邀请和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在这所闻名遐尔的大学，在这个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我度过了近四百个终身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真是一个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

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FCEAR)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研究员江忆恩(A. Iain Johnston)教授和图书管理员南希(Nancy Hearst)小姐给予的多方面帮助，在使我熟悉美国尤其是哈佛的环境、进入研究角色的过程中，他(她)们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北京办事处及其主任塞奇(Tony Saich)教授对我哈佛之行的热情鼓励和积极赞助。

感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我近两年研究工作的大

力支持。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及本丛书主编陈昕先生对笔者一如既往的信任；并感谢胡小静先生再次出任拙著的责任编辑，他的鉴赏能力和严谨态度确实让人敬佩。

感谢我的研究单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与支持；这里虽未提及他（她）们的姓名，本人心中实已铭记。

但愿这本书是对他（她）们以及所有关心和信任我的读者的一个好的回报。

1997 年 10 月于哈佛大学

引 论

国际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研究学科,萌发于近代西欧,成型于战后时期,近半个世纪以来它的实际中心一直在美国。这是各国学者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西方,这门学科究竟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甚至于怎么称呼,学术界的各家各派并没有共识。大致了解一下不同看法,对于读者阅读后面的内容,会有一些帮助。

一 关于名称

本书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也叫“国际政治学”),是流行于当代西方有关这一学科的多种称谓之一。经常见到的,还有“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国际关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事务研究”(the stud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关系研究”(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 IR study)或者“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y),以及

“世界政治理论”(th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等概念。依笔者本人有限的知识,西方学者在表达这一专业的学科属性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理论”。

一般说来,它们各自的涵盖面并无大的差别,因而也往往被交替使用。但是,不论表述上有何不同,上面已经提到的术语,均明显有别于“国际经济”或者“世界经济”等概念。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在我国,人们经常用“国际关系”一词笼统地概括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甚至国际文化关系^①。而在西方,凡说“国际关系”,尤其当谈论“国际关系”的理论时,必指本书所讨论的“国际政治”内容。概念表述上的这种差别,多与习惯有关,并无对错之分;不过,既然现在我们探讨的对象是西洋的学问,把“国际关系”锁定在国际政治层面,应当算一个前提。

有趣的是,在西方,概念使用上的不同,有时与使用者的国别及研究兴趣有一定联系。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布尔(Hedley Bull)指出,英国学者喜用“国际理论”的表述,它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帝国”思想传统;但这种表述“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突出‘关系’的概念,仅仅强调了‘理论’一词”;他本人宁肯用“国际关系研究”一词^②。在当代西方学术“龙头重镇”美国,以及(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比较常用的叫法是“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使用也不在少数,它与“国际政治理论”并列为最常见的两个词)。大体上看,美国学者是从5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接受了这一提法的,其原因可能与美国国际政治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巨大影响有关,后者在1948年出版的、现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学主要经典之一的《国家间政

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书里,自称其宗旨为“展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to present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③。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盛,以“世界政治”概念取代“国际政治”一词的趋势有所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美国以外地区的一些学者)希望超越传统的范畴;“世界政治”被使用者赋予了比国际政治更广泛的内涵;其中,主要是加上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化问题的研讨,和对所谓“国家中心”范式的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从使用频率上看,“国际政治”概念仍然排列第一,但“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被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加。

西方专攻此项的研究家,还有深一层的分析:“国际政治理论”一词所以为美国人推崇、偏爱和广而告之,与美国的地位、影响和美国人的心态不无关系。“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这一概念的运用常常造成各种困惑,而且有探究不深之嫌”;唯独在美国,它的使用“似乎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而不止是(像不少国家的情形那样)满足于对现有理论探索的批判指责”。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代表着某种希望和信念,即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而不只是片面和局部的理论体系;它不只是某个单纯的、普通的理论,而是真正有关“国际关系”的一般性学说,这种学说将尽可能地减少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给人们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④。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它可能有助于增加我们理解问题的角度。

第七章将介绍美国人在二战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作用,这里只做一点提示:无论从整个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看,或者从理论层面具体考察,人们都不难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像自然科学和人

文学科研究的许多领域的情形一样,也如同美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处于领风气之先的位置。在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甚至连词汇术语、研究范式、新议“怪论”也多半出自美国人之手;除少数基本上不处于主流的理论——如法国著名国际政治大师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的“古典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派”),得益于当代德国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英国人特别钟爱且自成体系的“国际社会理论”,或者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倡导的“多边主义学说”——,整个西方国际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是一部美国国际政治学。这种情形也许证明了一个道理:国际政治理论永远是大国的理论,好比统治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 研究对象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际政治学者对于这一学科的对象有许多争论,至今仍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见解有如下四种:

1.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的外交和国家间的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外交政策研究;按照这种见解,它基本上属于“政策学”的范畴。具体说法或者所揭示的内容可能不大一样,但持这种见解的人基本同意,国际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首先是国际间各国政府面临的变化多端的形势,其次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各国对外交往的经验教训,最后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对外政策及其依据。这既是普通人经常持有的见解(表述虽然不一定明确),也是一种有历史传统的看法。在近代

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应当以国家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基本对象。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到但丁(Dante)的君主论,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无不坚持类似的主张。众所周知,近代欧洲的历史,素以外交斗争、势力均衡、国际联盟和国家法的各种传说及“故事”著称于世,因而上述看法的形成并非偶然。

这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思想传统,影响到近代以来欧美一批国际政治史家、理论工作者和教授国际关系的讲师。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⑤

一本流传于 80 年代的美国国际政治教科书评论道:“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⑥

造成这一认识的原因,除了历史的一面外,还有现实的、可能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政府的需求和决策者的强烈偏好。美国当代最有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之一、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前主任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分析道:“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将着眼点盯在国家决策上的人,视自己为理所当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他们为‘国王们’的巩固自身权力和强化国家利益之举出谋划策。战略研究家这

方面尤为明显,他们中有许多人一转身就变成智囊人物或决策者。……他们全力‘揭示’国家利益的概念或促进‘世界秩序’的政策,认为它们会与本国乃至全球的需要相吻合。”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两个原因说明为何来自政府的诱惑会如何之强烈:其一,“国际政治仍然基本上是一种国家上层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ates)”。政府在其间势必起主导作用。它引导许多人相信国际政治的内涵实质与国家的对外关系无异。而且,从研究者的角度说,国际政治事务的许多信息和数据(如国际组织的会议,各种演讲和文件等)不可能从政府以外的地方弄到。其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与华盛顿的关系越密切,飞黄腾达的机会越大”;它既有助于实现事业上的抱负,也利于个人各方面地位的改善^⑦。

本书第三章《科学主义挑战历史主义》和第四章《全球主义与“百家争鸣”》将会介绍,在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确被很多人当成外交政策研究或对外战略研究的同义语,国家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Containment)战略和“接触”(Engagement)战略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国家和经济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所能提供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大学和一些公司内有国际关系研究出身或背景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经常作为“座上宾”出入华府,或者保持着学界政界“双栖”的显赫权位。理论之“社会效用”的命题,通过国际政治学这一特殊学科得到最好的注解(或许在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经济学能与之媲美)^⑧。

2. 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国家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位(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

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等等。当然，这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同样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特殊的研究领域和方式，有独到的启示和教训。

这一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他在其引起广泛和持久争论的名篇“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1966年发表)中提出，如果所谓的“国际理论”指的是一种“探索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并且把它想象成政治学的“双生子”，那么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国际研究中确实存在人们引述的一些重要论述，如马基雅弗利或康德(Kant)的个别作品，然而它们是零散的、无联系的，实际上不具有政治经典的地位。“政治经典”，指的是在政治学研究中或者政府学研究中，学生们能够读到的那些经久不衰的、自成一体的、反映整个学科观念发展历程的伟大作品，它们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里从古代的柏拉图(Plato)到当代的拉斯基(Laski)的不朽思想，其间有亚里斯多德(Aristotle)、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等思想家及其著作。在很多人所说的“国际研究”学科，并不存在这样的群体特征和思想连贯性。

怀特分析说，如果说政治学是有关国家(state)的理论，那么国际政治学则应当是一种有关国际社会或国际共同体(the society of states, or the family of nations, 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理论。但这种理论一直散见于国际法中。本世纪以前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大都记载在法学家的政治文集里，埋在历史学家的著作深处，收藏在哲学家的随想录里，或者包含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公函、演讲和回忆录中。依据怀特的判断，在古典的政治传统中，“国际理论即使存在，